

党组织嵌入对信息透明度的影响研究

——来自国有企业的经验证据

毛志宏, 魏延鹏

(吉林大学 商学院, 长春 130012)

摘要: 以 2013~2017 年国有上市公司年报数据为样本, 从“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领导体制的视角研究党组织嵌入对信息透明度的影响。结果发现: 党组织成员任职于上市公司“董、监、高”后, 极大地促进了信息透明度的提升; 尤其是董事长兼任党委书记更加有利于这种治理效应的提升; 而董事长与党委书记两职合一的同时若再兼任总经理则起到了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 在内部控制水平低和市场化程度高的公司中, 党组织嵌入对信息透明度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 而董事长、党委书记和总经理三职合一则表现出更为显著的抑制作用。

关键词: 党组织嵌入; 信息透明度; 董事长兼党委书记; 内部控制; 市场化程度

DOI: 10.13956/j.ss.1001-8409.2020.08.03

中图分类号: F27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409(2020)08-0012-07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Party Organization Embedding on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State-owned Enterprises

MAO Zhi-hong, WEI Yan-peng

(School of Busines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nual report data of the state-owned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3 to 2017,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party organization embedding on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wo-way entry, cross-serving” leadership system. Result shows that party organization members work in the directors, supervisors, and supervisors of listed companies, which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In particular, chairman concurrently holds party secretary are more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is governance effect. But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roles of the chairman and the party secretary, while concurrently serving as the general manager has an inhibiting effect.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in the companies with low level of internal control and high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the party organization embedding has a more obvious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whil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hree posts of chairman, party secretary and general manager shows a more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Key words: party organization embedding;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chairman concurrently holds party secretary; internal control; marketization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微观表现之一,公司治理体系应当融入体现中国特色的党组织。党组织领导作用的发挥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过程中至关重要。2013年,中组部和国资委党委联合发布的相关文件中,明确了党委在央企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内涵、要求和规则程序。同时对2004年提出的党组织成员依照法定程序分别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层,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层的党员依照有关规定进入党委会的“双向进入”领导体制和党委(党

组)书记、董事长由一人担任的“交叉任职”领导体制的具体要求进行了细化。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企党建会议上的讲话再次明确要求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可见,国企党组织嵌入的主体资格在法律、法规层面上不断深化。

现有研究证实了党组织嵌入在降低代理成本、减少隐性腐败、抑制避税行为以及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4],但尚缺乏验证党组织通过不同领

收稿日期: 2020-03-26

基金项目: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19B55); 吉林大学廉政研究与教育中心廉政建设专项研究项目(2018LZY002)

作者简介: 毛志宏(1961-),男,吉林省吉林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财务会计与公司治理; 魏延鹏(1993-),男,河北张家口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财务会计与公司治理(通讯作者)。

导机制嵌入公司治理后对信息透明度产生何种程度影响的研究。随着国有上市公司党组织嵌入迫切性的增强,学术界亟待从实证上检验党组织嵌入对公司信息透明度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领导体制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而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完善国有上市公司党组织嵌入后的公司治理体系,以确保党组织“领导作用发挥组织化、制度化、具体化”^①,以益于全面防范市场风险,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基于此,本文实证检验了“双向进入”领导体制下的党组织嵌入和“交叉任职”领导体制下的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及董事长、党委书记与总经理三职合一对公司信息透明度的影响。并从内部控制和市场化程度两方面检验内外部环境对党组织嵌入与公司信息透明度的调节作用。

本文的贡献在于:①通过检验不同领导体制下党组织嵌入对信息透明度的影响,丰富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发挥领导作用的实证研究;②通过人工整理数据构建信息透明度指数,并检验内外部环境对党组织嵌入与其关系的影响,增强了研究结论的普适性;③研究结论为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党组织嵌入的相关政策提供经验依据,也为年报使用者正确认识党组织嵌入对公司信息透明度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参考。

1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1 党组织嵌入与信息透明度

信息透明度的实质是利益相关者通过解读公司披露的各种财务与非财务信息,以此分析隐藏在信息背后的公司“本质”^[5]。信息透明度对于理解公司战略、经营和风险等十分重要,也是股东对公司证券价值做出决策时考虑的必要因素。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公司将内部信息传播给股东、监管者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程度各不相同。这种信息不对称情况可能出现在不同的群体之间,如管理者和其他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不管是哪种情况出现都会导致投资者做出错误决策,降低资本市场的有效性。一般而言,公司信息不透明程度越高,外部市场对管理决策的审查就会变得越困难,并可能加剧公司治理环境的恶化^[6]。不透明的信息环境下,所有者无法跟踪监管经营者行为,后者可能选择做出自利的偏离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经营决策行为,产生道德风险问题,进而产生代理成本问题。本文认为,党组织嵌入可以很好地解决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监管不到位的情况,弱化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代理成本问题,进而提升信息透明度。

基于国有企业的特殊属性以及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必须强化党在国有企业中的领导地位。经济层面上,强化党的领导作用有助于弥补由于市场固有的滞后性、自发性等缺陷带来的决策失灵。政治层面上,加强党的领导有助于把控国有企业发展的政治方向,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法律和监督机制本身并不能够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政府监管的公平公正法则会增加投资者的信心,使其坚信经理层会受到监督,产权会得到保护。Bushman等研究发现,当来自政府的监管力度增强时,企业的会计核算会更为严谨,同时更愿意在财

务报告中及时披露信息甚至是坏消息,以避免受到监督的惩罚^[7]。与来自外部政府监管相比,来自公司内部党组织嵌入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层等决策和监督机构显然更能够起到提升信息透明度的作用。党委成员与董、监、高的重合以及交叉任职,有助于提高决策制定和执行效率,促进企业改善生产经营管理,提升信息透明度。但是,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会导致“自己监督自己”问题的出现^[8],此时董事会对管理层的监督不再有效,董事长可能为追求个人私利而偏离股东权益最大化,进而产生更加严重的代理成本问题。本文认为,董事长兼任党委书记能够提升公司的信息透明度。但是,董事长、党委书记和总经理三职合一则会因产生代理成本问题而抑制信息透明度的提高。基于此提出假设:

H1a “双向进入”领导体制下,党组织嵌入显著提升公司信息透明度。

H1b “交叉任职”领导体制下,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显著提升公司信息透明度。

H1c “交叉任职”领导体制下,董事长兼党委书记的同时再兼任总经理则会抑制公司信息透明度的提升。

1.2 内部控制、党组织嵌入与信息透明度

国有企业天然的产权缺陷导致其容易造成所有者缺位问题,并产生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内部控制的目标之一在于确保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真实性,高质量的内部控制通常拥有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环境,能够对公司管理层开展行之有效的监督和管理^[9]。而低质量的内部控制由于缺乏完善的内部监管体系以及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基于主观趋利动机下的管理层会通过盈余管理手段操纵会计信息,降低财务报告质量以隐藏其寻租行为^[10]。内部控制水平低的公司,由于更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代理成本问题、以及道德风险产生的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大大降低公司信息透明度,严重损害国企的经营效率。党组织作为国企改革过程中引入的遏制“内部人控制”的有生力量^[1],一方面通过“讨论前置”的决策程序把关定向,保证企业决策符合政策方向,同时进一步提升国企内部控制水平并促使其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另一方面通过党委成员嵌入董、监、高,加强对原有治理结构的内部监督,进而增强其信息透明度。

此外,本文认为内部控制水平低的公司最缺乏的是对管理层的内部监督,董事长兼党委书记促使处于管理岗位的党员干部除需接受市场监管外,还需接受来自党的章程和纪律的更为严格的双重监督,约束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而提高信息透明度。但是兼任党委书记的董事长若再兼任总经理则破坏激励相容的实现,降低了管理层自利行为的机会成本^[11],三职一带来职责上的混淆很可能诱发更严重的代理成本问题,导致更差的信息透明度。基于此提出假设:

H2a: 内部控制水平低的公司,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嵌入治理对信息透明度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

H2b: 内部控制水平低的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对信息透明度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

H2c: 内部控制水平低的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的

①详见2019年11月,中央政治局审议的《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

同时再兼任总经理对信息透明度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

1.3 市场化程度、党组织嵌入与信息透明度

国有企业特殊的经济地位使其受到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双重影响。地区法治化水平高低、投资者保护机制建立与否影响着会计信息质量的优劣^[12]。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法律环境更加透明,产权保护更加完善,资本运作方式更加多元且趋于市场化,无形中增强对公司信息透明度的要求。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面对同地区或同行业公司的强大竞争压力,国有企业更加需要提升公司信息透明度,并通过及时的信息披露获得更多投资者的青睐。党组织作为党在国有企业的代表,通过“双向进入”领导体制实施内部干预方式更直接、成本更低的优势,保证了在党的方针指引下公司决策能够更加顺畅地“上传下达”,有益于国有企业把握公司战略方向,提升公司信息透明度。

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低市场化程度的地区,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整体拥有更加倾斜的政府资源,国有企业依然可能通过多渠道的政商关系进行寻租,从而降低信息披露的质量^[13]。党组织通过董事长兼任党委书记这一“交叉任职”领导体制赋予其更加完整的治理权限,进一步加强对管理层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监督,降低政府官员与国企管理层相互寻租的可能性,进而提升公司信息透明度。但是若董事长兼任党委书记的同时再兼任总经理,过度的权力集中则会导致其在公司治理层面和政治层面同时拥有绝对的领导权,容易造成一权独大的情况,反而抑制信息透明度的提升。基于此提出假设:

H3a: 市场化程度高的公司,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嵌入治理对信息透明度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

H3b: 市场化程度高的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对信息透明度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

H3c: 市场化程度高的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的同时再兼任总经理对信息透明度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选取2013~2017年沪深两市国有上市公司年报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党组织嵌入数据通过巨潮资讯网、企业官网等渠道人工收集董、监、高任职情况中涉及公司党委成员的信息。行业类别数据来自全球行业分类系统(GICS),利用行业分类代号的前2码对公司进行分类。其他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对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①剔除金融类、ST和*ST上市公司的样本。②剔除相关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③为消除极端值对实证检验的影响,对重要的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分位数的缩尾(Winsorize)处理。最终获得1738个样本观测值。

2.2 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为验证不同领导体制下党组织嵌入与信息透明度的关系,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回归模型:

$$Ct_{i,t} = \alpha_0 + \alpha_1 Dsh_par_{i,t} + \alpha_2 Jsh_par_{i,t} + \alpha_3 Ggc_par_{i,t} + \alpha_4 Dual_par_{i,t} + \alpha_5 \sum Controls_{i,t} + \sum Year + \sum Ind + \varepsilon_{i,t} \quad (1)$$

信息透明度指数(Ct)。常见的构建方式包括直接使用政府组织或者学术研究机构的评估结果作为替代变量和研究者自行构建指数两种方式。我国学者使用较多的

是深交所制定的信息披露考核指标^[14,15]。由于本文研究样本包括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若使用深交所制定的公司信息披露考核结果,可能造成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因此,本文采取人工整理影响信息透明度的相关指标并自行构建指数的方式进行实证研究,使研究结论更具普适性。借鉴Deb等通过买卖价差指数、交易量指数、分析师跟踪指数和分析师预测误差指数4个指标构建信息透明度指数^[16]。买卖价差指数是卖出价与买入价之差除以买入价和卖出价的均值。交易量指数是全年股票成交金额除以流通在外的总市值。分析师跟踪指数是每年跟踪每家上市公司的分析师团队数量。分析师预测误差指数是分析师平均每股收益预测与实际公司每股收益之差的平方。将这4个指标分别排列成10组,其中最不透明的公司取1,最透明的公司取10。对上述指标加总求和并进行均值处理。所得指数的取值范围为1~10,数值越大表示公司信息透明度越高。

党组织嵌入。关于党组织成员的概念界定,以在上市公司年报中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部分出现的有关党委成员的字段包括党委(副)书记、党群工作部主任、党委成员等作为本文党组织成员的构成。使用党组织成员与董、监、高重合比例的3个指标(Dsh_par、Jsh_par和Ggc_par)作为衡量“双向进入”领导体制下党组织嵌入指标。同时使用董事长与党委书记两职合一(Dual_par)以及董事长、党委书记和总经理三职合一(Dual_par2)这两个虚拟变量作为衡量“交叉任职”领导体制下党组织嵌入指标。

借鉴相关文献,根据其他研究者对于控制变量的选择情况引入其共同的控制变量(Controls):公司规模(Size)、成长性(Growth)、经营业绩(ROA)、财务杠杆(LEV)、最终控制人持股比例(Ratio),同时控制时间(Year)和行业(Ind)这两个虚拟变量。各变量的定义和测量方式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定义及测量方式

变量名称	符号	测量方法
信息透明度指数	Ct	见详细构建过程
董事会党组织嵌入	Dsh_par	党委人数与董事会人数之比
监事会党组织嵌入	Jsh_par	党委人数与监事会人数之比
高管层党组织嵌入	Ggc_par	党委人数与高管层人数之比
两职合一	Dual_par	董事长兼任党委书记取1,否则取0
三职合一	Dual_par2	董事长兼任党委书记及总经理取1,否则取0
公司规模	Size	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成长性	Growth	净利润增长率
经营业绩	ROA	总资产收益率
财务杠杆	LEV	资产负债率
最终控制人持股比	Ratio	最终控制人持股数除以总股本数
年份	Year	哑变量
行业	Ind	哑变量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信息透明度指数的均值为6.082,标准差为1.375,结合其他数值可见,样本公司的信息透明度指数分布较为均衡。董事会党组织嵌入的均值为0.144,监事会党组织嵌入的均值为

0.167,高管层党组织嵌入的均值为0.168,董事长兼任党委书记的均值为0.221。党组织嵌入各指标的第一四分位数均为0,表明当前阶段样本公司的党组织嵌入程度普遍较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公司党委成员的任职情况并非年报的强制披露内容,存在部分公司年报未披露完整的党委成员信息的情况。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第一四分位数	中位数	第三四分位数	最大值
Ct	6.082	1.375	2.500	5.250	6.000	7.000	9.250
Dsh_par	0.144	0.127	0.000	0.000	0.111	0.222	0.500
Jsh_par	0.167	0.177	0.000	0.000	0.200	0.333	0.667
Ggc_par	0.168	0.226	0.000	0.000	0.111	0.222	1.000
Dual_par	0.221	0.415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Size	23.110	1.393	20.450	22.104	22.924	23.796	27.703
Growth	0.469	1.699	-0.973	-0.144	0.101	0.380	14.89
ROA	0.048	0.038	-0.013	0.014	0.034	0.062	0.193
LEV	0.477	0.185	0.069	0.337	0.485	0.621	0.865
Ratio	0.400	0.150	0.105	0.295	0.400	0.510	0.8416

3.2 多元回归分析

表3列示了党组织嵌入与信息透明度的实证结果。由列(1)至列(3)可见,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层党组织嵌入与信息透明度分别在1%、5%和10%水平显著正相关,表明随着党组织嵌入程度的不断加深,公司信息透明度也得到显著提升,H1a成立。由列(4)可见,董事长和党委书记两职合一与信息透明度在10%水平显著正相关,促进了信息透明度的提升。作为董事会的绝对核心,董事长在公司决策中有着一定的话语权,作为党委会一把手的党委书记在党委发挥政治作用中所起到的领导作用更是无可取代。董

事长兼任党委书记更好地实现国有企业经济作用和政治作用的有机结合,对完善信息透明度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H1b成立。由列(5)可见,董事长、党委书记和总经理三职合一与信息透明度在1%水平显著负相关,抑制了信息透明度的提升。虽然董事长兼任党委书记确保了党组织在国有上市公司中处于政治核心地位,保证了公司经营决策与国家政策的一致性,但若再兼任总经理容易使公司的经营发展受到董事长个人特质的影响。权利的过于集中降低了决策的有效性,加剧了董事会与各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不对称,不利于信息透明度的提升,H1c成立。

表3 党组织嵌入与信息透明度

变量	(1)	(2)	(3)	(4)	(5)
Dsh_par	0.794*** (2.91)				
Jsh_par		0.407** (2.11)			
Ggc_par			0.467*** (2.73)		
Dual_par				0.133* (1.76)	
Dual_par2					-0.433*** (-2.78)
Intercept	5.915*** (29.33)	5.911*** (29.27)	5.905*** (29.27)	5.920*** (29.24)	5.923*** (29.47)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Ind	YES	YES	YES	YES	YES
Adj-R ²	13.54%	13.30%	13.48%	13.23%	13.77%
N	1738	1738	1738	1738	1738

3.3 进一步分析

表4列示了内部控制水平对党组织嵌入与信息透明度的影响。以迪博数据库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指数为分组依据,根据公司内控指数是否大于中位数将其划分为内部控制水平高组(H_Icidi)和内部控制水平低组(L_Icidi)。由列(1)至列(5)可见,对于内部控制水平高的国

企,仅有董事会党组织嵌入以及董事长、党委书记和总经理三职合一与信息透明度在10%水平显著正或负相关。由列(6)至列(10)可见,对于内部控制水平低的国企,全部党组织嵌入指标与信息透明度均显著相关,且各指标t值的绝对值均大于内部控制水平高组。可见,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水平越低,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领导体制嵌

入治理以及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对信息透明度的提升作用越明显,而董事长兼党委书记的同时再兼任总经理则对

信息透明度的抑制作用越明显,假设 H2a、H2b 和 H2c 成立。

表4 内部控制、党组织嵌入与信息透明度

变量	H_icidi					L_icidi				
	(1)	(2)	(3)	(4)	(5)	(6)	(7)	(8)	(9)	(10)
Dsh_par	0.698*					0.646*				
	(1.76)					(1.80)				
Jsh_par		0.282					0.496**			
		(0.96)					(1.96)			
Ggc_par			0.378					0.396*		
			(1.54)					(1.89)		
Dual_par				0.030					0.206**	
				(0.27)					(2.04)	
Dual_par2					-0.588*					-0.311**
					(-1.65)					(-2.27)
Intercept	6.119***	6.100***	6.112***	6.139***	6.072***	5.744***	5.761***	5.734***	5.720***	5.774***
	(21.35)	(21.09)	(21.40)	(21.34)	(21.08)	(20.52)	(20.67)	(20.38)	(20.36)	(20.67)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Ind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dj-R ²	14.50%	14.51%	14.44%	14.16%	14.32%	13.22%	13.27%	13.17%	13.30%	13.73%
N	871	871	871	871	871	867	867	867	867	867

表5列示了市场化程度对党组织嵌入与信息透明度的影响。以王小鲁等发布的分省份市场化指数为分组依据^①,根据公司注册地所在省份评分是否大于中位数将其划分为市场化程度高组(H_Market)和市场化程度低组(L_Market)。由列(1)至列(5)可见,对于市场化程度高的国企,除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外,其余党组织嵌入指标与信息透明度分别在1%或5%水平显著正或负相关。由列(6)至列(10)可见,对于市场化程度低

的国企,仅有董事会党组织嵌入和高管层党组织嵌入与信息透明度分别在10%和5%水平显著正相关,且各指标t值的绝对值均小于市场化程度高组。可见,国有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领导体制嵌入治理以及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对信息透明度的提升作用越明显,而董事长兼党委书记的同时再兼任总经理则对信息透明度的抑制作用越明显,假设H3a、H3b和H3c成立。

表5 市场化程度、党组织嵌入与信息透明度

变量	H_market					L_market				
	(1)	(2)	(3)	(4)	(5)	(6)	(7)	(8)	(9)	(10)
Dsh_par	0.866***					1.031*				
	(2.77)					(1.79)				
Jsh_par		0.508**					0.237			
		(2.26)					(0.57)			
Ggc_par			0.445**					0.778**		
			(2.23)					(2.20)		
Dual_par				0.141					0.166	
				(1.63)					(1.02)	
Dual_par2					-0.451**					-0.301
					(-2.22)					(-1.44)
Intercept	6.191***	6.168***	6.191***	6.201***	6.199***	5.030***	5.062***	4.990***	5.021***	4.879***
	(27.55)	(27.38)	(27.50)	(27.51)	(27.69)	(11.60)	(11.48)	(11.54)	(11.44)	(11.09)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Ind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dj-R ²	14.64%	14.45%	14.48%	14.29%	14.69%	12.46%	11.59%	12.78%	11.81%	12.95%
N	1360	1360	1360	1360	1360	378	378	378	378	378

4 稳健性分析与内生性检验

4.1 稳健性分析

基于“讨论前置”决策机制,董事会进行“三重一大”等重大经营决策前应经由党委会讨论通过^[17]。独立董事

虽然无法参加公司党委会,但董事会独立性是董事会执行监督职责的有效保证^[18]。若独立董事在其他公司担任党委委员等职务,其同样能够站在党组织的角度思考问题,仍能够在董事会中发挥相应的作用。因此,本文使用

①王小鲁等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仅报告了截止到2016年的指数,本文中2017年分省份市场化指数由2016年代替。

独立董事党组织嵌入(Ind_dsh_par,即独董中担任其他公司党委成员人数与独董人数之比)和合计党组织嵌入(Party,即党委人数与董监高人数总和之比)作为党组织嵌入的替代变量纳入模型进行回归。表6实证结果证实了本文结论的可靠性。

4.2 内生性检验

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检验。寻找工具变量的核心在于,要求其自变量高度相关而与残差项和因变量高度不相关^[19,20]。滞后一期的自变量被认为是符合要求的工具变量,因此本文使用滞后一期的自变量(Lag_Dsh_par、Lag_Jsh_par、Lag_Ggc_par)作为工具变量并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检验。鉴于董事长兼任党委书记以及董事长、党委书记和总经理三职合一均为二元变量,使用Heckman两阶段法进行检验。表7实证结果表明研究结论排除了内生性的干扰^①。

表7 内生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Lag_Dsh_par	0.845*** (38.73)									
Lag_Jsh_par			0.778*** (28.86)							
Lag_Ggc_par					0.891*** (33.25)					
Lag_Dual_par							4.463*** (19.64)			
Lag_Dual_par2									5.159*** (9.91)	
X		0.658* (1.83)		0.141 (0.51)		0.406* (1.70)		0.171* (1.91)		-0.508*** (-2.80)
Lamda								0.093 (0.60)		0.292 (0.86)
Intercept	0.018 (1.59)	5.766*** (25.95)	0.005 (0.25)	5.783*** (25.71)	0.033 (1.59)	5.752*** (25.77)	-4.826 (-0.14)	5.756*** (25.64)	-6.757 (-0.20)	5.921*** (29.47)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Ind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dj-R ²	68.98%	15.15%	60.22%	14.95%	64.78%	15.14%	40.63%	15.11%	7.50%	14.64%
N	1370	1370	1370	1370	1370	1370	1370	1370	1370	1370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党组织嵌入视角研究政治干预对公司信息透明度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国有上市公司中,“双向进入”领导体制下,党组织嵌入显著促进了信息透明度的提升。这为传统意义上的公司治理注入了属于中国特色公司治理的新鲜血液。“交叉任职”领导体制下,董事长兼任党委书记有效提升了信息透明度。但是,董事长兼任党委书记的同时再兼任总经理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上述治理效应。这充分说明董事长与党委书记两职合一制度的优越性,同时应避免出现三职合一的情况。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党组织嵌入对信息透明度的提升作用在内部控制水平低和市场化程度高的公司更加明显,但是三职合一则产生了更加明显的抑制作用。

本文的启示:①国有上市公司应当毫不动摇地坚持党

表6 稳健性分析

变量	(1)	(2)
Ind_dsh_par	0.779*** (3.47)	
Party		0.844*** (3.27)
Intercept	5.941*** (29.64)	5.992*** (29.18)
Controls	YES	YES
Year&Ind	YES	YES
Adj-R ²	13.68%	13.64%
N	1738	1738

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认真执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让更多优秀的党委成员进入到公司治理结构中,使其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国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②坚持董事长兼任党委书记的领导体制,增强党组织在董、监、高的参与度。保证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始终贯彻党的意志,保证公司发展在政治和经济方向上始终一致。③规避董事长、党委书记和总经理的三职合一,以避免权利过于集中造成“一权独大”的情况,影响公司信息透明度。强化对国企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履职行权的监督,保证公司内部最高决策权和监督权的统一,抑制内部人控制问题的产生。

参考文献:

- [1] 马连福,王元芳,沈小秀.中国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效应研究——基于“内部人控制”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2,

①Lag_Dual_par和Lag_Dual_par2的Heckman检验的λ均不显著,说明不存在样本选择性偏误,表3结果支持原假设。

- (8): 82-95.
- [2] 严若森, 吏林山.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国企高管隐性腐败的影响[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21): 176-190.
 - [3] 李明辉, 刘笑霞, 程海艳. 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上市公司避税行为的影响[J]. 财经研究, 2020, 46(3): 49-64.
 - [4] 徐光伟, 李剑桥, 刘星. 党组织嵌入对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J]. 软科学, 2019, 33(8): 26-31, 38.
 - [5] 张程睿, 王华. 公司信息透明度: 经验研究与未来展望[J]. 会计研究, 2006(12): 54-60, 96.
 - [6] Anderson R C, Duru A, Reeb D M. Founders, Heirs, and Corporate Opa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9, 2(2): 205-222.
 - [7] Bushman R M, Piotroski J D, Smith A J. What Determines Corporate Transparency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4, 42(2): 207-252.
 - [8] 陈亚光, 储婕. 公司治理结构对信息透明度影响的实证研究[J]. 经济纵横, 2015(5): 21-25.
 - [9] 张艺琼, 冯均科, 彭珍珍. 公司战略变革、内部控制质量与管理层业绩预告[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9, 34(6): 68-77.
 - [10] Smith J D. US Political Corruption and Firm Financial Policie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6, 121(2): 350-367.
 - [11] 李建标, 李帅琦, 王鹏程. 两职分离形式的公司治理效应及其滞后性[J]. 管理科学, 2016, 29(1): 53-69.
 - [12] Leuz C, Nands D, Wysocki P.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Investor Protection: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3, 69(3): 505-527.
 - [13] 申宇, 傅立立, 赵静梅. 市委书记更替对企业寻租影响的实证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9): 37-52.
 - [14] 袁奋强, 季婷, 李惠蓉, 等. 股权结构、信息透明度与公司绩效——基于深市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 经济与管理评论, 2017, 33(4): 64-77.
 - [15] 谭劲松, 宋顺林, 吴立扬. 公司透明度的决定因素——基于代理理论和信号理论的经验研究[J]. 会计研究, 2010(4): 26-33, 95.
 - [16] Deb P, David P, O'Brien J. When is Cash Good or Bad for Firm Performance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7, 38(2): 436-454.
 - [17] 强舸. 国有企业党组织如何内嵌公司治理结构? ——基于“讨论前置”决策机制的实证研究[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8(4): 16-23.
 - [18] Peasnell K V, Pope P F, Young S. Board Monitoring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Do Outside Directors Influence Abnormal Accruals? [J].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uditing, 2005, 32(7-8): 1311-1346.
 - [19] Harada K, Nguyen P.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and Dividend Policy in Japan [J]. Managerial Finance, 2011, 37(4): 362-379.
 - [20] Faff R, Kwok W, Podolski E, et al. Do Corporate Policies Follow a Life-cycle? [J].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016(69): 95-107.

(责任编辑: 张 勇)

(上接第11页)

- [8] Leroux N, Wortman M S, Mathias E D. Dominant Factors Impa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Business-To-Business(B2B) E-Commerce in Agriculture [J]. The International Food and Agribusiness Management Review, 2001, 4(2): 205-218.
- [9] Ng E. An Empirical Framework Developed for Selecting B2B E-Business Models: the Case of Australian Agribusiness Firms [J].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Industrial Marketing, 2005, 20(4/5): 218-225.
- [10] Montealegre F, Thompson, S R, Eales J 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Success of Food and Agribusiness E-Commerce Firms [J]. International Food and Agribusiness Management Review, 10(1030-2016-82496). 2007.
- [11] Kalaitzandonakes N, Kaufman J, Wang X. Firm Entry through E-Commerce in the Us Agricultural Input Distribution Industry [J]. Journal on Chain and Network Science, 2003, 3(2): 123-133.
- [12] Brush G J, McIntosh D. Factors Influencing E-Marketplace Adoption in Agricultural Micro-Enterpris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 Business, 2010, 8(4-5): 405-432.
- [13] 鲁钊阳. 政府扶持农产品电商发展政策的有效性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18(05): 56-78.
- [14] 林家宝, 胡倩. 企业农产品电子商务吸收的影响因素研究——政府支持的调节作用[J]. 农业技术经济, 2017(12): 110-124.
- [15] 王胜, 丁忠兵. 农产品电商生态系统——一个理论分析框架[J]. 中国农村观察, 2015(04): 39-48+70+96.
- [16] 任保才, 马新明. 农资电商平台发展浅析[J]. 中国农学通报, 2013, 29(11): 198-202.
- [17] 侯振兴. 区域农户农企采纳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影响因素[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8(1): 66-74.
- [18] 郭鸿鹏, 于延良, 赵杨. 电商平台农产品经营主体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阿里巴巴电商平台数据[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6(1): 42-48+163.

(责任编辑: 张 婧)